

★印第安纳两百年州庆系列★

印州造就的精英人物：丁韪良（上）

本报特约撰稿人：王辉云



丁韪良（图源：丁韪良纪念馆）

为中国现代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友邦人士缺少了解，甚至一无所知。

丁韪良到中国的背景

1827年，丁韪良出生在印第安纳南部小镇Livonia，父亲是个牧师，他们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受家庭影响，他从印第安纳大学毕业后，又进入新阿尔巴尼（New Albany）长老会神学院研读神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当牧师。如果丁韪良没去中国传教，印第安纳可能会多出一个杰出的本地牧师，而中国则会失去一位古道热肠的国际主义战士。

为什么一个印第安纳的年轻牧师会跑到中国传教，并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呢？这不得不归功于十九世纪早期在说英语的国家里发生的宗教大复兴，这一运动导致宗教活动蓬勃发展，也促进了海外的传教活动，于是，英美国家的不少传教士离开家乡，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去传播基督信仰。因此，十九世纪被称为传教的伟大世纪。

成长于宗教大复兴的时代，胸怀为上帝传播福音的伟大理想，在美国第一波海外传教热潮的激励下，丁韪良毅然做出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前往中国传教。

到中国传教无疑是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此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一直不太理想。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被称为“景教”的聂斯脱里派基督教经由波斯传入中国。但由于其内部争斗和未能深入民间，影响相当有限。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中国还没站稳脚跟的基督教又撞上排斥外来宗教的厄运。公元845年，唐武宗笃信道教，下旨禁止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等其他宗教，于是，尚未扎根来的基督教在中国便终止了传播。此后，相对于中国本土的儒教和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

自鸦片战争中国门户被打开以后，西方传教士才得以大量进入中国传教，以天主教和新教为主的基督教各宗派才开始在中国有了初见规模的发展。然而，这次基督教声势浩大地进入中国，恰好是跟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后面，因此在中国也多少沾上点儿侵略者的宗教的嫌疑，也使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被打上征服者的烙印。

1850年，23岁的丁韪良带着新婚妻子和哥哥一起前往中国传教。他们在广州刚一下船，便遭到当地民众的围攻。可见当时中国的一般百姓，对洋人和洋教还是相当排斥的。面对这种局面，丁韪良并未退缩。像当年去爱尔兰传教的圣徒派垂克一样，他选择留下来向异教徒传播福音。他们在广州略作停留后，即乘船北上，开始了在中国漫长的传教生活。

丁韪良首次来到中国

尽管中国的门户已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但清政府对西方文化的抵制依然非常强烈，对传教士更是戒心

重重。碍于与列强签订的条约，又不能禁止西方传教士入境，因而，只允许他们在五个开放的通商口岸传教。丁韪良在中国早期传教的地方是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

在中国传教，不会中文是万万不行的。对大多数西方传教士来讲，学中文是一大难题。面对这一挑战，不少西方传教士知难而退。虽然丁韪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他不仅勇于接受挑战，而且还做了充分的准备。丁韪良具有高于常人的语言天赋。来中国之前，他已基本掌握了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等几门外语。到宁波后，学习中文成了他的当务之急。在学习过程中，他还发明了一种注音方法，即用拉丁文字母稍加变通，创造出的一套音标。使用这种方法，他很快就学会了宁波话，不久便能用流利的宁波话传道。为了推广这一发明，他在1851年1月与人合作，用拉丁字母编出一种用于书写“宁波话”的拼音系统。

说到汉语拼音，近代从西方国家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所做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马礼逊、丁韪良、威妥玛等人都是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威妥玛拼音系统曾经在汉语拼音之前在国际上广泛应用，至今，港台许多人名地名依然使用威氏拼音。从丁韪良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能够发明出用于书写“宁波话”的拼音系统这件事可以看出，这个年轻的传教士不仅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具有创新精神。他不仅是个颇有使命感的传教士，而且还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

丁韪良在宁波10年，除传教活动外，还分别参与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由于丁韪良通晓汉语，1858年中美谈判期间，他应邀担任美国公使列维廉（William B. Reed）的译员，参与谈判并起草了《天津条约》。

在宁波传教期间，丁韪良笔头甚勤，随时记下一些传教心得，几年功夫，便积少成多，汇集成书，名为《天道溯源》。丁韪良在这本书中尝试着将儒家道德伦理与基督教思想相融合，论证两者并行不悖。此书的读者对象是中国高层人士，丁韪良意欲先让中国的官员和知识阶层接受他的理论，然后再由他们影响民众接受福音。因此，他在担任美国代表团译员，以及后来在北京工作时，都尽量找机会把此书赠送给清政府高级官员。

没成想，《天道溯源》出版后立马成了畅销书。自1854年至1912年间，先后再版达三、四十次之多，并被译成日文和韩文，广为流传。由于丁韪良“学土音，习词句，解训诂，讲结构。不数年，而音无不正，字无不酌，义无不搜，法无不备”。在宁波传教这种基层锻炼使他的汉语和神学理论水平得到空前提高。1860年，丁韪良偕全家回美国度假期间，获拉斐特学院（Lafayette College）神学博士学位。尽管他没有在校读学位，但这个学位与现今那些在职读博或从党校获得文凭的官员的学位相比还是很有含金量的。

按说在中国传教10年才回美度假，丁韪良理所当然的应该好好歇息一下，但他却一直没闲着。在美国期间，他到处巡回作报告，在全美各地宣传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呼

吁美国的基督徒支持中国的传教事业。

丁韪良把自己的心放在了在中国，太平洋彼岸的东方古国才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再次来华

1862年夏天，丁韪良夫妇带着两个最小的男孩，从纽约乘船再次来华。我们知道，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对西方传教士进入内陆的禁令已经解除。于是，他决定前往北京建立教会并开办学校，以便实现他的远大理想。此后，除了几次短期离开外，直到1916年去世，丁韪良都住在北京。

总结在宁波10年的传教经验，丁韪良意识到要在中国传播福音，必须走利玛窦等人的路子，那就是通过教育传播现代知识来传播基督教。为了使中国人相信，基督教可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丁韪良立志从教育入手，通过教育向中国人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和基督信仰。1864年5月，他在老朋友、中国海关总署任总税务官的英国人赫德（Hart, Sir Robert）的支持下，开设了一所走读学校，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基督徒，然后派出去做传教士。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崇实中学，丁韪良即为首任校长，并担任此职20年之久（1865-1885年）。这就是现今位于交道口大街的北京第二十一中学的前身。

移居北京后不久，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这本书在当时是最新和最为通用的国际法蓝本。早在作为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参加《天津条约》谈判时，丁韪良就亲眼看到过清朝大臣耆英与列维廉因外交礼节而产生争执，感到清政府太需要了解并掌握国际法了，因而萌生了翻译、介绍西方国际法的念头。

丁韪良的这一想法得到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 H. Anson）的鼓励和支持。由于清政府也非常需要这方面的知识，闻讯后立即责成总理衙门与丁韪良商谈，经过谈判，双方很快达成协议，使翻译出版此书成为一个跨国合作项目。

在清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国助手的无私帮助下，丁韪良旋即开始《万国公法》的翻译工作。当然，在没有翻译软件，外语人才稀缺的清朝末年，人手再多，也不见得能帮上多少忙。因此，主要的翻译工作还得由丁韪良一人来干。他高超的汉学水平和丰富的法学知识为翻译此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翻译此书，丁韪良不但系统钻研了海量的中国典籍，成了不折不扣的中国通，而且还成功地打入了京城上流社会。恭亲王奕訢、李鸿章、曾纪泽、张之洞、郭嵩焘等当时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都成了他的座上客。有次聚会，喝酒划拳，吟诗唱和之际，恭亲王惊叹其驾驭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能力与学识，赠给这个西方大儒一个“冠西”的雅号，意为其中学之功，雄冠西儒。此后，便有所谓丁韪良，字冠西之说，这就是他字号的来源。

《万国公法》译完后，受到恭亲王等人的激赏。恭亲王下令由总理衙门专拨银两付印出版。该书对近现代中国



京师同文馆教习丁韪良（中）和几个学生在他的住所（图源：丁韪良纪念馆）

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丁韪良在书中创造了很多新的中文词汇，如权利、主权、法院、人民、国体、自治、章程、政治、选举、司法、国会、制宪等，使中国人开始了解西方世界，懂得诸如民主、平等、自由、权利、法治、选举等重要政治和法律制度、观念，为中国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大门。《万国公法》在出版后第二年，日本开成书局就把它翻译过去，并在日本先后翻印了五次。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该书成为日本大专院校法学课的教科书。

《万国公法》出版后很快派上了用场，当年德国人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一只丹麦商船，发生纠纷，总理衙门这回找到了对己有利的依据，援引《万国公法》中有关条例据理力争，最终迫使德国将截获船只移交中国。此后，总理衙门将《万国公法》颁发各省督抚备用。

成功翻译出版《万国公法》后，丁韪良名声鹊起。1865年3月，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和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Wade）的推荐下，丁韪良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教习，教授英文；1867年，同文馆又决定聘请丁韪良开设国际法课程。1869年，清廷任命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1869-1894），同时担任清政府国际法顾问。同年，他辞去了长老会的教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同文馆的工作中。他在同文馆总教习任上与恭亲王奕訢和总理衙门的洋务派大臣们交往密切，不仅在办理外交方面给这些洋务派献计献策，而且在建设中国新式教育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一时期的丁韪良似乎从传教士华丽转身，踏上了传统中国的“学而优则仕”之路。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之乱，清朝的一部分官员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力，提出“师夷长计以制夷”的策略。朝廷为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也不得不打破“华夏中心”的观念，放

下身段，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比较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封疆大吏，思想也比较开放。他们知道要跟鬼子斗，先得跟人家学造洋枪洋炮不可。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沿海各省率先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通过官督商办等模式，开始建立近代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因此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中国向西方学习，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而主持这类工作的官员或者与此有关的人员，则被称为洋务派。

京师同文馆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洋务运动初期，与外国交涉和联系日益频繁，急需翻译人才。在恭亲王的倡议下，清同治元年（1862）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专门培养外语翻译人才。

丁韪良就是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进入同文馆的。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若要帮助中国现代化，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中国培养人才。

京师同文馆是相当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同文馆内的教习均为洋人，专门训练外交官和翻译人才。最初，同文馆设英文馆（相当于系），后增设法文、俄文。1867，又设天文和算学馆。“但此后两年之中，领袖无人，创始诸人也不再存奢望，同文馆遂趋衰落”。为了扭转颓势，1869年，朝廷启用丁韪良为总教习，振兴同文馆。

为了突破同文馆发展的瓶颈，丁韪良按照美国的教育模式对同文馆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先后增设了德文、格致（当时对声光电等自然科学的统称）、化学等馆；扩大了教师和学生队伍；增开大量新课，如算学、格物、化学、医学、机器制造、西洋史地和万国公法等科；设立实验室、图书馆、博物馆和印书处，并对学制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大胆改革。

（本文下半部分将于4月14日刊登，敬请关注。）